

文章编号:2095-0365(2025)01-0041-07

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路径

张金肖, 孙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农业农村发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实现农民高质量增收是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促进农民收入质量提升成为助力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民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进而赋能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促进收入来源多元化和协同化,进而优化农民收入的内部和外部结构,驱动农民各收入来源保持长期稳定,以及提高农民在获取收入过程中运用自身积累的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的能力。基于此,为进一步推进农民收入质量提升,要强化以收入质量提升助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夯实农村基础设施“硬件”与公共服务“软件”的数字环境,不断提升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最后要通过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多方联动治理机制来加强数字监管。

关键词:数字经济;收入质量;收入数量;农民收入;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5.01.06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了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缩小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1],分析这三大差距并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来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而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该群体能否实现高质量增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党和国家历来关注农民增收问题,近10年来中国农村发展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绝对贫困得到彻底消除,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但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加上自然灾害等影响,导致农民收入存在结构失衡、增速减缓、稳定性差,以及收入来源不确定性增加等问题。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如何快速实现农民农业经营增效和就业增收成为当前“三农”工作重要任务。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研究单一的农民收入数量视角已不足以全面解析当前农民增收乏力的现象,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鉴于此,如何实现农民高质量增收成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而推动收入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是实现农民高质量增收的关键,促进农民收入质量提升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了基础,也使得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赋能要素升级进而驱动生产力发展^[2],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和转型。《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指出,2022年我国

收稿日期:2024-0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包容性创新视角下农村精准脱贫成效评估及可持续机制研究”(18CGL042);校级重点培育项目“乡村生态价值实现的富民效应及实现路径研究”(23HNCDXJ13)

作者简介:张金肖(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民收入与农村发展。

本文信息:张金肖,孙璐.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1):41-47.

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亿元,并稳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以一种新业态、新模式的形态蓬勃发展。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三农”的赋能作用,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指出,要“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聚焦数字经济解决“三农”领域现实问题也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实现农民高质量增收是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应有之义。在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以及全面实施数字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收入质量如何定义?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鉴于此,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可以从新的视角为推动农民收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建言献策。

二、农民收入质量的基本内涵及特性分析

(一)农民收入质量的基本内涵

已有文献从不同理论或视角对“收入质量”的概念和内涵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王欣等^[3]首次提出“收入质量”的概念,并从收入的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成本性,以及知识性等 5 个维度考量了农民工收入质量,阐述了农民工收入质量概念的学术意义。随后,任劼^[4]借鉴收入分配等相关理论,针对农民群体提出“农民收入质量”这一概念,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民收入稳定性替换为成长性来考察农民收入质量优劣程度,同时研究发现,收入成本这一维度对农民的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影响较小。已有学者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重新界定农户收入质量内涵,将收入质量定义为个体在获取收入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潜在或可行能力所体现出的质态差异特性总和,试图突破以往收入引致经济活动效果研究中因过度强调收入的数量属性而产生的解析局限性,并从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知识性、成长性,以及成本性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5]。但也有学者提出,成本与农民生产性消费具有同质性,是不同于收入属性的经济元素,难以准确反映收入的质量特性^[6],且已有研究表明收入成本性对农民的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影响较小,因此,将收入成本性纳入农民收入质量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基于此,本研究依托收

入质量理念,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同时立足乡村全面振兴时代背景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宏观视角,认为农民收入质量是从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收入知识性多个维度反映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获取收入能力的质态差异特性总和,即农民收入质量除收入数量充足单一维度外,还包括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增长可持续性,以及农民在参与经济活动获取收入中知识和技能的应用能力等其他维度,从多个方面综合评价农民收入的好坏和优劣程度。

(二)农民收入质量特性分析

农民收入质量以收入数量充足为基础,并与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和收入知识性等维度联动,从而综合评价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和收入优劣程度。农民收入质量越高,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就越强,也就意味着农民收入数量越充足,结构越合理、增长越稳定,同时农民在获取收入的过程中知识含量越高、获取成本越低。

1. 收入充足性

收入充足性是用来衡量个体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时所获取的收入数量水平这一维度能否满足其生产生活资金需求的重要内容。收入充足性能够直观地体现农民收入质量有关数量维度的好坏和优劣程度,以及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生活质量、农业生产能力,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理论上,农民收入数量的充足是收入质量提高的根本前提^[4]。农民收入充足性体现在绝对收入充足和相对收入充足两个方面,农民收入质量反映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资金数量,农民收入数量较低时,收入充足性代表性较强,而在农民收入数量较快增长时,收入充足性仅体现为收入质量的单一维度,代表性也会相应减弱。

2. 收入结构性

收入结构性是衡量收入来源是否多元、各来源比例以及相互关系是否合理协调的主要维度。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产业、需求以及分配等结构持续优化改善,不断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同理,农民收入也应该从速度型增长模式向结构型增长模式转变,收入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农

民收入质量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农民收入来源的不同以及各收入比例的差异,都会影响到农民收入结构的合理性。我国农民现有的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大类,农民收入来源越多元、主要收入来源所占比例越高以及各收入来源比例越均衡,则说明其收入结构越合理,即收入结构性越好。农民收入来源由原来的单一化逐渐向多元化、市场化和非农化转变,能够促使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均衡发展,合理的收入结构则有助于分散农民生产风险、提升农民生计韧性。

3. 收入成长性

收入成长性是用来衡量农民各来源收入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维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民,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关注内容,确保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群体的收入维持快速增长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7]。从工资性收入增长率、经营净收入增长率、财产净收入增长率,以及转移净收入增长率多个层次衡量农民收入成长性。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所获取的劳动报酬型工资的成长性;经营净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农民参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得收入的成长性;财产净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农民通过配置管理自身所拥有的全部资产所获得收入的成长性;转移净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国家财政政策扶持力度以及政府为农民提供的转移支付等收入的成长性。

4. 收入知识性

收入知识性是指农民在获取收入过程中自身积累的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是农民收入质量的核心维度。基于教育回报率机制,以农民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为主要代表的人力资本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8]。农民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农民收入水平。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对农民生产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要具备更新的农业生产知识、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等现代化技能。高人力资本意味着农民获取、理解和整理农业生产信息并将其运用于生产实践中的能力越高,农民可以利用自身知识积累和技术经验,并借助先进科学生产技术和高效整合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有助于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从而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整体收入。理论上,农民人力资本越高,则说明收入知识性越好,农民收入质量越高。

三、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理论逻辑

共享性的数字平台、包容性的数字技术和普惠性的数字金融等具有较强的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能够创造人人都有参与机会、人人的可行能力均有所提高的良好氛围,数字经济成为赋能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新动能和新引擎。理论上,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民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进而赋能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促进收入来源多元化、协同化和合理化进而优化农民收入的内部和外部结构,驱动农民各收入来源保持长期稳定,以及提高农民在获取收入过程中运用自身积累的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的能力。因此,数字经济从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和收入知识性4个方面赋能农民收入质量的提升。

(一)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数量充足

农民依靠自身内生动力和可行能力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是农民总收入的主要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收入的数量和质量。

1. 在经营性收入方面

首先,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发挥信息效应、效率提升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从而增加农民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一是信息效应。以数字化信息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使农民可以及时、有效、准确地获取农业信息以及供需调节、价格变化等市场信息,解决农民在生产、流通、销售、交易各个环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等难题,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二是效率提升效应。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设备深度融合,智能灌溉技术、动植物病虫害监测技术、土壤自动检测技术等应运而生,农民可以了解到自然灾害指数、农药肥料投入使用情况,以及大气温湿度综合对比数据等信息,实现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农业经营的精细化、农业管理的智能化,从而提升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进而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来为农民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三是规模经济效应。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打破了农

产品交易的地域空间限制,极大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从而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重要保障,农民将会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9]。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缓解农民信息和资金约束来增加其创业行为,进而提升农民的创业经营收入。一方面,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推进,极大提高了农村的通信设备接入率与互联网使用效率^[10],能够拓展农民接收、整理、利用创业信息的广度与深度,有助于提高农民创业活跃度。另一方面,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农村金融排斥问题,提高农民创业所需金融资源的可得性,有利于激发农民的创业意愿,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数量。

2. 在工资性收入方面

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加强信息互动、催生新业态、提高就业质量等促进农民非农就业,进而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首先,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拓宽了农民的就业信息获取边界和搜寻工作渠道,提高了劳动力要素市场供需匹配效率,有助于促进农民参与非农就业,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其次,依托数字技术发展和融合应用的数字经济催生了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农民创造了大量新岗位、新职业,增加农村劳动力新增非农就业机会,成为提高工资性收入的重要推动力^[11]。最后,产业数字化发展加大了非农企业智能化机器设备的投入,数字产业化通过重塑工作特征降低了农民非农就业的体力劳动强度和危险程度,有助于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12]。

(二) 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结构优化

解决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缩小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一大挑战^[13]。在一系列支农惠农富农政策影响下,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收入模式从速度型增长向结构型增长转变,农民收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优化,而结构优化具有明显的收入效应,成为促进农民增收、收入质量提升的重要一环。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各收入来源合理化,通过优化收入结构,助推农民高质量增收。数字经济能够缓解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信息和资金约束,并拓宽其收入来源,通过产业发展和非农就业显著提升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优化其收入结构。在农民各项收入来源中,转

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占比较小,但仍是优化收入结构、推动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投资渠道是制约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14],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契机。农民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平台,根据个人能力和偏好,自主选择储蓄存款、银行理财,及基金购买等多种综合性的金融产品来提升财产性收入。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与融合,使得农民可以接触互联网及时获取政府部门、企业机构,以及社团组织经常性转移支付信息和政策,同时依托信息技术建立的便捷支付渠道,便于把转移性资金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大大提高了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可得性和支付的便捷性。

(三) 数字经济赋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我国“三农”工作的核心问题,也是扎实推动农民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以及数据供给无限性等特点,通过技术变革优化生产要素、催生新业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增强农民增收能力,确保农民收入较城镇居民快速协调增长,成为农民持续增收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同时,随着数字乡村发展行动的推进,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各方面逐步融合应用,缓解农民的信息和资金约束,优化农民创业环境,真正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从而在更大区域范围内释放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的红利,促进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四) 数字经济赋能农民知识性收入提升

以知识和技能为代表的收入知识性表示农民在获取收入过程中运用自身积累的知识素养和技能经验的能力,是收入质量的反映。一方面,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数字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其发展所集聚的大量数据资源所衍生的信息供给平台,不仅能够传递和匹配城乡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供需信息,还能够打破教育资源的时空、地域限制,通过发展远程教育、在线平台等新型学习方式促进教育均等化^[15],降低农民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提升农民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农民人力资本提升,不仅有助于更新农民传统观念、提高农民掌握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实现农业经营增收,而且能够帮助农民摆脱次级劳动力市场,增强其市场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性报酬。此外,产业数字化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其发展带来的新增非农就业岗位知识驱动性较强^[16],对农民的文化水平、数字素养、知识储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为防止自身被“挤出”劳动力市场,将主动学习运用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提高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提升知识性收入水平。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推进路径

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蓬勃发展的一种更高级经济形态,通过数字技术变革和经济结构重塑,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共享性的数字平台、包容性的数字技术和普惠性的数字金融等为助推农民收入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机遇,为进一步推动农民收入质量提升,在强化以收入质量提升助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夯实数字环境,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监管。

(一)重视收入质量:强化以收入质量提升助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

1. 宏观层面

应更加重视农民收入质量问题,将农民收入质量作为“三农”发展政策的评估标准纳入到宏观经济监测体系,优化农民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全方位动态评估、检测农民收入质量变化趋势,以便及时了解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运行走势。值得注意的是,要摒除“唯数量论”的传统观念,树立以质量为导向的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农民收入质量长效提升的支撑保障机制,借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不断优化农村经济体制和支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环境,保持农民收入质量提升的良好势头,加快塑造以提升农民收入质量引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增长新模式,强化以收入质量提升助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

2. 微观层面

于农民个体而言,收入渠道单一会导致其风险防范能力偏低,收入结构欠佳会导致其收入后续动力不足。因此,农民要主动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等加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学习,将资本积累转换成自身的可行能力。农民可行能力的提高可以保证农民高质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改善自身福利状况,持续提升收入质量^[17]。

(二)夯实数字环境:升级基础设施“硬件”与公共服务“软件”

1. 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夯实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支撑,也是信息化驱动农民增收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加快补齐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短板至关重要。要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开展农村地区4G基站补盲建设,并以需求为导向逐步推动5G网络、千兆光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新基建向乡村延伸覆盖。同时,要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升级,推动公路、水利、电网、冷链物流等乡村传统基础设施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为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农业数字化升级、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硬件”支撑^[18]。

2. 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提升乡村信息服务的惠民水平

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运用数字科技加强乡村多场景多领域的数字化、信息化应用和推广,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便民惠民效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19],要推动乡村“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健康”等发展形式,夯实农村地区教育和医疗的信息化基础,深化数字技术在乡村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中的融合应用,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有机会更便捷地获取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为农民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提升提供“软件”保障。此外,要深化农村地区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信息服务,将农民就业、创业、社保服务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结合,增强“就近办、线上办”能力,提升农民就业、创业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效能。

(三) 弥合数字鸿沟:不断提升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

新时代背景下城乡“数字鸿沟”问题的主要矛盾逐渐从基础设施差距转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差距,即“群体数字鸿沟”。目前,群体之间“数字鸿沟”的产生,归根于社会各群体在收入、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平等和差距,从而在信息化中获取、加工信息出现了“鸿沟”^[20]。“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导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发展能力差异越来越大,从而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因此,要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全面促进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尽可能消弥“数字鸿沟”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培养农民数字学习能力。形成政府部门引导,社会组织、行业企业、农村社区多方联动的宣传学习机制,通过专题讲座等线下以及农民群体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平台等线上相结合形式,加大对数字知识、数字平台、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工具的宣传与推广力度,推动广大农民积极转变旧有思维,激发农民群体主动、积极运用数字发展成果的数字学习意识和能力。其次,提升农民数字技能水平。推动政府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多途径推动数字培训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对农民进行农村电商、数字化营销、智慧农业软件应用等形式多样的数字技能培训工作,多元化、全方位提高农民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和将数字化资本存量转化为资金收入的能力。最后,增强农民数字安全意识。鼓励和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学

习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农民辨别、防范网络谣言和电信诈骗等虚假信息的能力。

(四) 加强数字监管: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多方联动治理机制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数字经济逐渐融入农业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极大改变了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但是,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随之而来的一些数字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加强数字监管和数字治理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十分必要。

一是国家政府层面。要加强数字领域的风险防控,优化数字治理的法律法规。在原有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不断补充、修订和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依法大力打击涉农信贷和保险、数字金融产品,以及网贷平台等领域中的互联网金融诈骗行为,对肆意盗窃、破坏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非法行为进行严惩,为农民安全参与数字经济活动保驾护航。

二是科研企业层面。高科技企业要加大数字监管技术研发,改变过去过度依靠事后严厉处罚的传统监管范式,加大数字平台使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产品质量等方面的事前事中监管力度,形成事前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并重的治理框架,全程加强数据信息的收集、获取、储存与使用安全保护。三是农民个体层面。农民要树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积极参加各种网络知识安全教育培训,培养主人翁意识,通过线上平台主动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对违法产品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举报,为数字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 [1]马太超.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重点领域与现实挑战:首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论坛暨两岸乡村振兴与“三茶”成果展会议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23(10):175-184.
- [2]周文,叶蕾.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2):17-28.
- [3]王欣,孔荣.农民工和农民、城镇居民的收入质量与横向公平比较:基于农民工自我感知调研[J].软科学,2014,28(1):110-114.
- [4]任劼.农民收入质量对其消费及投资的影响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7.
- [5]彭艳玲,苏岚岚,孔荣.收入质量及其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鲁、豫、陕、甘4省1373份农户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9(12):56-67.
- [6]杨少雄,苏岚岚,孔荣,等.农民收入质量:逻辑建构、测度评价与动态演进[J].中国农村经济,2023(8):18-36.
- [7]黄季焜.加快农村经济转型,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J].农业经济问题,2022(7):4-15.
- [8]岳华,韩彩霞,王海燕.新时代我国乡村教育深化、人力资本提升与农民收入提高[J].上海经济研究,2024(1):78-87.
- [9]陈毅辉,洪碧云.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2):105-109.

- [10]陈文,吴赢.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鸿沟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南方经济,2021(11):1-17.
- [11]刘自强,张天.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J].当代经济研究,2021(12):93-102.
- [12]张广胜,王若男.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J].中国农村经济,2023(1):58-76.
- [13]陈健,曾世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全面乡村振兴探索[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7(4):36-41.
- [14]李谷成,李烨阳,周晓时.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孰因孰果?[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112-127.
- [15]王凤婷,王浩,熊立春.农村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生活质量:机制与事实[J].浙江社会科学,2023(8):4-14,156.
- [16]徐伟祁,李大胜,闫玉科.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8):33-38.
- [17]关江华,黄朝禧,胡银根.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微观福利为视角[J].经济地理,2013,33(8):128-133.
- [18]李晓辉.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8(2):36-42.
- [19]杨胜利,王媛,冯丹宁.共同富裕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与实践检验[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8(2):19-27.
- [20]程名望,张家平.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19(2):19-41.

Theoretic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Empowering Farmers to Improve Income Quality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ZHANG Jinxiao, SUN Lu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high-quality increase in farmers' incom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quality has become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quality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operating and wage incomes, thereby enabling farmers to earn sufficient income,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synergisation of income sources, thus optimiz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 of farmers' income, driving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farmers' ability to apply their accumulated knowledge, literacy and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earning incomes.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income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improving income quality to help the common prosperity, consolidate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of the rural infrastructure "hardware" and public service "software", constantly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skills of farmers, and finally strengthen digital supervision by establishing a multi-party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enterprise-individual".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ncome quality; income quantity; farmers' income; digital technique